



外语语言文学博士论丛

本书由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省重点学科建设经费”
和“211工程建设经费”资助出版



张乃禹 著

中韩小说现代化转型 比较研究



苏州大学出版社



外语语言文学博士论丛

本书由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省重点学科建设经费”
和“211工程建设经费”资助出版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13YJC752036)

张乃禹 著

中韩小说现代化转型 比较研究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韩小说现代化转型比较研究/张乃禹著.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3. 9
(外语语言文学博士论丛)
ISBN 978-7-5672-0637-3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小说研究—对比研究—
中国、韩国 IV. ①I207.42②I312.6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15512 号

中韩小说现代化转型比较研究

张乃禹 著

责任编辑 许周鹁

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苏州市十梓街 1 号 邮编: 215006)

常州市武进第三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地址: 常州市武进区湍里镇村前街 邮编: 213154)

开本 880 mm×1 230 mm 1/32 印张 8.25 字数 215 千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72-0637-3 定价: 32.00 元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 0512-65225020

苏州大学出版社网址 <http://www.sudapress.com>

序

一衣带水的中国和韩国进入 20 世纪以后,虽然政治和文化环境不同,却都步入了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发展的新时期。它们之间的相似点在哪些方面,不同点又在哪些地方,这是张乃禹这部著作所要告诉我们的内容。

比较研究自然会有很多新的话题,因为本体的各自背景和内涵不一样,不一样就有新鲜感,这是比较研究的优势。这样的优势在这部专著中同样体现了出来。但是,比较研究最有价值的地方恰恰不是同一性和差异性的对比,而是它们之间的关系研究,这是比较研究最为困难的地方。从这样的思路出发,我认为这部专著论述的以下几个问题最有价值。

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文学对古代韩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在学术界基本上是共识。但是,在现代韩国,特别是在沦为日本殖民地以后,日本的影响明显大于中国,中国的现代文化与现代文学对韩国还有没有影响呢?作者强调中国现代文化与现代文学对韩国的现代文化与现代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问题是怎样产生影响的呢?并不是中国的思想启蒙家有意对韩国施展什么影响,而是韩国的思想启蒙家有意接受。中国思想启蒙家常常从中华民族正在被殖民化的担忧中对韩国表现出深深的同情,常常以韩国的现实为例不断地激励自我,表达对中国未来的担忧。而这些同情和实例却被韩国的思想启蒙家看作对韩国的好感和关注,从而接受了中国启蒙家的那些启蒙意识,并将之用于本土文化的启蒙中。张乃禹这种对现代中韩文化、文学关系的梳理和分析建立在现场思维的角度上,即将现代中韩之间的文化、文学交流建立在当



时客观的社会背景中思考。影响者和被影响者并不是有意的施展影响和接受影响,而是各自从当时自我的立场出发而产生了影响和被影响的关系。这样的思维符合当时的中韩现状,也为这本著作建立了坚实可信的研究基础。

在中国的现代文化与现代文学发展进程中,梁启超的理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韩国文学现代化转型的诸多外部力量中,梁启超同样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成为促成韩国传统小说理论转变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当时影响韩国现代化的外来力量很多,却对梁启超小说思想情有独钟,使其成为文学变革的推动力量,这是什么原因?这部著作一方面就梁启超对韩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的影响过程与路径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另一方面对梁启超及其理论在韩国产生影响的原因和结果作了精彩的论述。

当下中韩文学比较研究的相关著作中,鲜有学者论及通俗文学。张乃禹却将其作为重要的论据加以论述。张乃禹认为:现代性的发生离不开思想启蒙。在中韩两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中,通俗小说作家也同样为“启蒙”做出了贡献,他们是启蒙主义的先行者。因此,在论著中他重点论述中韩通俗文学的启蒙意识:救亡精神。对通俗小说的愉悦精神,作者也进行了科学的分析。特别是对韩国的通俗小说所体现出来的愉悦精神与保国、保种、保文字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很有创建。

张乃禹作为一名教授韩语的教师,学术研究当然要考虑与自己熟悉的韩国有关的论题,这是当时他与我商量博士论文选题的时候,我们共同设定这个论题的出发点。当初,选题设定之后,我最担心的就是他仅仅将中韩两国文化、文学的现代化过程进行对比一下而完事,后来看到了他的初稿,我的担心显然是多余的。比较是有,思考更多。特别是当这些思考充满着学理和创建时,那就很值得赞许和推崇了。正因为如此,他的博士论文受到了答辩委员会的一致好评,被评为优秀等级。

读博期间确实是张乃禹人生中的重要时期,他恋爱、结婚、生





子均在这个时期完成。这么忙,却能完成一部高质量的博士论文,他的很多师兄弟都很羡慕他,我也有些好奇。当时对他的读书报告和文章、论文提出意见后,没几天,他就会根据修改意见拿出新的作品来。我曾经对他如此快的修改感到惊奇。有一次,我问了他的太太杨老师后,才知道答案。杨老师说,张乃禹真的很勤奋,除了必须完成的生活程序之外,他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读书、思考和写作上了,而且,他的性子很急。听了他太太的话,我才明白其中的缘由。其实,这就是投入和专注,背后的辛苦大概只有他与他的太太最有感知。

博士论文是学术之途上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它既是一段时期集中学术研究的总结,又是新的学术起点的开始。祝愿张乃禹在以后的学术道路上有新的发展和前景。此为序。

汤哲声

2013年8月于苏州大学北校区教工宿舍



目 录

序	(1)
绪 论	(1)
第一章 中韩小说现代化转型期的社会文化背景	(19)
第一节 历史背景:内忧外患之中社会形态的嬗变	(21)
第二节 传播媒介:现代报纸杂志大量涌现	(26)
第三节 创作群体:稿酬制度确立与职业作家登场	(32)
第四节 阅读受众:新式教育与现代都市的形成催生 读者群体	(38)
第二章 梁启超与中韩小说现代化转型	(46)
第一节 梁启超著述思想在近代韩国的传播与接受	(48)
第二节 中韩小说理论变革承传关系考辨	(61)
第三节 “新文体”对中韩小说文体革新的不同影响	(73)
第四节 梁启超与韩国“讨论体小说”的关联性	(84)
第三章 中韩小说现代化转型的同一性	(93)
第一节 传统与现代:继承传统,肇始现代	(95)
第二节 小说观念:从“不登大雅之堂”到“国民之 罗盘针”	(114)
第三节 语言载体:“文言白话消长起伏”与“国语 国文运动”	(123)



第四节	创作技巧:叙事模式的转变与创作技法的革新	(137)
第四章	中韩小说现代化转型的差异性	(153)
第一节	主题意识:“讽刺谴责”与“爱国新民”	(154)
第二节	文学格局:“对立批判”与“共生并存”	(165)
第三节	文化冲击:“儒家思想”与“西方宗教”	(173)
第四节	政治事件:“五四运动”与“三一运动”	(184)
第五章	同一性与差异性的内外因素	(191)
第一节	通俗小说的启蒙与推动作用	(191)
第二节	日本与西方文学的影响	(205)
第三节	中韩文学最后的影响关系	(224)
第四节	半殖民地与完全殖民地的社会现实	(232)
结束语		(238)
附录	中韩小说现代化转型大事年表(1902—1919)	(246)
主要参考书目		(250)
后记		(255)

绪 论

自古以来,在东亚汉文化圈内,中韩^①两国可谓历史悠久、关系密切。两国作为一衣带水的邻国,在历史长河中,各方面的交流从未中断,中国对韩国产生的影响甚巨。尤其在文学方面,属于汉字文化圈的韩国,其古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都不曾脱离过中国文学的影响,以汉文、汉诗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学甚至主宰了整个韩国古典文学的发展进程,甚而韩国本国民族文学的兴起与发展也受到了压制。这种情况到近代后期开始发生改观。这是因为,两国同时遭受了西方列强或日本的殖民侵略,一向兴盛的两国文学交流传统于此时开始急转直下。从此以后,两国的文学发展轨迹从比较文学上所说的“影响关系”衍变到“平行关系”,这可以说是中韩文学交流史上影响最深远、最具划时代意义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正是缘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韩两国直面的社会现实问题。19 世纪末,积贫积弱中韩两国不可避免地相继遭到西方列强的入侵,并成为世界霸权争夺的对象。1840 年,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英国用长枪利炮叩开了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强迫

^① 现在“韩国”这一国名的全称为“大韩民国”,1945 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韩国成功脱离日本的殖民统治而获得独立。由于当时苏联和美国的共同介入,1948 年原本统一的民族国家被分裂为“大韩民国(南部)”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部)”,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中国对南北两方一直称呼为“南朝鲜”和“北朝鲜”,直到 1992 年中韩建交,对两国的称呼改为“韩国”和“朝鲜”,一直沿用至今。而“朝鲜”这一名称在 1948 年南北分裂前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曾经代指整个朝鲜半岛。鉴于这种复杂状况和避免引起歧义,本书为了统一名称,除了引用文之外,都使用“韩国”这一国名。

中国签订了以《南京条约》为代表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门户洞开。而作为中国近邻的韩国,从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便逐渐受到法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军事骚扰和侵犯^①,通过明治维新迅速摆脱西方列强束缚并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道路的日本成为东亚强国,此后便把侵略的目光投向了同样是近邻的韩国。日本于 1876 年强迫韩国签订了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华条约》,标志着日本侵略韩国的开始。之后,韩国又陆续与美国、英国、德国、俄国等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被迫放弃闭关锁国的政策,这样韩国的国门也被打开了。因此,两国的近代化都是在日本以及西方列强的侵略下被动地实现的。西方列强的侵入,给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均带来了巨变。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这些变化必然体现在两国的文学之中。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中韩两国,腐朽昏聩的封建王朝在外来侵略的冲击下逐渐瓦解并最终走向末路。伴随着门户洞开而来的是西方的先进文化和思想,在这西风东渐的社会环境下,中韩小说逐渐摆脱了自古以来的边缘化地位,成为文学的主流。这时的小说表现的是“今社会”的人和事,小说中出现了在古代文学中从未出现过的新题材、新概念和新思想,与古代小说迥然有别。而且,这时小说开始与报刊等现代传播媒体结合起来,对当时社会现实问题的反映和思考是作品主要表达的主题,而作品中也时不时地表现出对读者如何为人处世的指导和劝诫,这种主题是古典文学中无法找到的,同时也可以说是现代文学的重要特色。随着现代报刊的纷纷创立,出现了一大批职业报人兼作家,小说的创作和传播方面出现了与古代迥然有别的生产方式;而且现代印刷业的发达、大都市的形成和大众市民的增多,都直接刺激了小说的进一步现代化并为之提供了广大的阅读受众。同时门户开放,西学东

^① 指 1866 年 7 月,美国舍门将军号武装商船强行进入大同江,在万景台与朝鲜民众发生冲突被焚事件。

渐,中韩两国进步知识分子开始关注西方,并大量翻译、介绍西方小说。域外小说的翻译与引进给中韩两国的文坛以极大的刺激和冲击。它引起了人们小说观念的变化,促进了中韩两国小说类型的完善,推动了中韩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丰富了中韩近代小说的语言,更进一步加速了两国小说现代化的转型。

范伯群先生曾经指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往往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都以‘五四’新文学运动为‘起点’,这样就会有意无意地遮蔽或忽视‘五四’前许多文学作品已经初具的现代性。”^①这说明1919年之前,中国小说就初步具有了现代性。而范伯群先生“中国通俗文学历史发展三段论”之第一段即为“开拓与启蒙”,这一段正是19世纪90年代至“五四”前后,并指出开创新文学的“五四”作家那时还处在年少时期,“因此,揭开中国文学现代化序幕的,责无旁贷地是由中国传统文人中能接受社会转型洗礼的作家们——即现代被我们称为通俗作家们——来承担的”^②。可以看出,当时很多作家作为早期启蒙主义者活跃在中国文坛上,推进着中国小说现代化的进程。同时,范伯群先生、栾梅健教授、汤哲声教授等都主张把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局之年定为1892年,这是因为“这一年出现了一部性质上有别于古代文学的小说——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③,这至少说明从中日甲午战争前,中国的小说就迈出了向现代化转型的步伐。而陈平原教授的专著《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④,仅通过书名就可以看

① 范伯群:《多元共生的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

② 范伯群:《多元共生的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

③ 汤哲声:《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思辨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④ 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出,他认为清末民初可以看作是中国现代小说的肇始期。

同样,韩国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朝鲜王朝末期,一方面民族内部对于腐朽的封建社会制度和儒学思想逐渐显现出了抵抗和觉醒意识;另一方面随着西方列强叩开了韩国的国门,随之而来的是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在经历了内忧外患的社会危机之后,历史赋予了韩国一个如何确立新的近代文化的时代课题。后因日本蓄意侵略,使韩国处于“丧失国权、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中,为了恢复国权,旨在宣扬自主独立和抵抗外来侵略的爱国运动蓬勃地开展起来。因此,韩国当时所面临的社会历史背景与中国基本一致,小说也同样经历了一个由传统到现代的过渡过程。当时的小说是以连载的形式发表在近现代报纸杂志上,反映了自由结婚、男女平等、风俗改良、爱国精神等新观念和新内容;形式上也逐渐打破了“公式化”的情节和千篇一律的表现方式;叙事时间、叙事视角和描写技巧均发生了不同于传统小说的转变;同时,故事时间缩短、登场人物对话增多、小说素材的现实性更加突出。虽然当时的小说家运用的创作技法还稍显稚嫩,比起文学的形象化,更加注重理念的传达,但是他们作为更具专业化的报人兼小说家,的确是用新的创作模式反映了新的社会内容和思想主题,而非古代小说常常表现的从历史的起承转合和人生的悲欢离合中总结历史或感叹人生的主题。因此,中韩两国几乎在同一时期,小说实现了由传统到现代的过渡转型,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一时期正是中国文学对韩国文学产生的影响逐渐衰弱并最终结束的阶段,此后两国文学开始呈现“平行发展”的格局。但是毕竟两国的具体国情和民族性诸方面均存在差异,因此两国小说由传统向现代过渡转型在具有很强同步性和同一性的同时,也存在着某些差异性。通过分析两国小说现代化转型的差异性,并试图找出差异性产生的内外因素,是本书着重解决的核心问题。

本书所探讨的“现代化转型”是指文学的现代化变革,主要是指近代中韩两国在内忧外患、门户开放的历史境遇下,以小说为代

表的两国文学在主题意识、语言载体、创作技法等方面,均发生了迥异于前代的深刻变革,并逐步实现了现代化转变的过程。而在这一转型的过程中,两国文学的现代性特征也一览无余地展现出来。所谓“现代化”,就是体现在物质基础、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以及文化心理诸领域的人类文明进入现代的演变过程,是一个脱离前现代而迈入现代的动态过程,同时也是“现代性”追求和确立的过程。而“现代性”作为一种通行的概念被广泛运用于西方哲学、经济学、伦理学和文学艺术领域则是始于19世纪之后。在中国大陆,“现代性”是在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被介绍,作为与后现代主义相对立的概念而在汉语中使用的。美国著名学者布萊克曾说:“从上一代人开始,‘现代性’逐渐被广泛地运用于表述那些在技术、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诸方面处于最先进水平国家所共有的特征。‘现代化’则是指社会获得上述特征的过程。”^①由此可以看出,现代化与现代性之间的因果关系,现代化是动态性的“因”,而现代性则呈现为静态性的“果”,正是通过现代化的过程,才产生了现代性的特征。因此,“现代性”与“现代化”一样,体现着20世纪中国和东方其他民族国家被西方强行拖入“全球化”时的共同境遇。严家炎先生认为:“现代性是指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新的知识理念与价值标准。”^②并且认为,其不仅是构成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因素,“并且也是它区别于中国古代文学的根本标志”^③。他曾经用“现代化”一词概括鲁迅小说的价值,将现代性视野引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之中。因此,文学的现代性与现代化转型研究是一个

① C. E. 布萊克:《现代化的动力》,周凤铭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

② 严家炎、袁进:《现代性: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显著特征》,《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第58页。

③ 严家炎、袁进:《现代性: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显著特征》,《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第59页。



历久弥新的课题。

中国清末民初的这一历史阶段与韩国的“开化期”^①到1919年“三一运动”之前的这一时期,在时间上基本相当。不论中国还是韩国,这一时期正是政治、经济、文化向现代化转型的时期,同时也是文学由古代向现代的转型阶段。小说作为文学的重要体裁之一,在这一阶段,逐渐摆脱了自古以来的文学边缘地位,成为文学的主流,经历了一个由古典小说向近现代小说转变的过程。阿英说过:“晚清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个最繁荣的时代。”^②而同时期的韩国也经历了社会转型期的阵痛,处于一个新旧交替、内忧外患、昏暗与希望并存的历史阶段。在传统与现代交替转型的社会大背景下,小说观念和小说地位的转变成为当时韩国社会变革的一部分,发生了未曾有的嬗变与转型。而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中韩两国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实现了小说的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两国小说的现代化转型具有很强的同步性和同一性。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1840)通常被认为是中国进入近代社会的开始,而韩国公认的进入近代社会的转折性事件是《江华条约》^③(1876)的签订。因此,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要早于韩国。但如果要对中韩两国的近现代文学进行比较研究,就须找到一个对两国而言都相对具有重要文学意义的起点。但是文学的演进变革毕竟不同于历史的变迁,它不能以某个重大历史事件为转折点。实际上,文学的分期往往要落后于历史的分期。所以,对于

① 随着1876年《江华条约》的签订,韩国开始接受西方及日本近代文明的影响,顽固的封建社会秩序受到冲击,直到1910年“韩日合邦”,韩国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这一历史时期被称为“开化期”,又被称为“近代转换期”、“启蒙期”、“爱国启蒙期”,时间上与中国的晚清一致,而开化期到1919年这一时间段则与中国的民初基本一致。

② 阿英:《晚清小说史》,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③ 《江华条约》,最初称《朝日修好条规》,日本和朝鲜于1876年2月26日,在朝鲜西海岸江华岛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迫使韩国开放大门,并逐渐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中韩两国来说,真正的文学现代化转型应该就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而小说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也基本是在此时期。汤哲声教授曾指出:“中国小说的现代化的起点是以清末民初的小说改革为标志的,它和‘五四’小说改革构成了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中的两个阶段。”^①陈平原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一书中指出,“中国近代新小说作品的出现大致开始于1902年《新小说》杂志创刊,止于‘五四’小说兴起”^②,可见1902年对于中国小说的现代化变革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这是因为,“‘新’的、‘近代’性质的因素终于发展成为我国文学的主潮,从而改变了我国文学的性质,是在1902—1903年间”^③。而且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发表《饮冰室诗话》正是在1902年。也是在1902年,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发表,为“小说界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样是在1902年,梁启超创办的中国第一份近代性质的文学杂志《新小说》创刊。次年,谴责小说开始在《新小说》《绣像小说》上连载,这些小说鲜明的“暴露”倾向标志着中国小说主题走向开始发生改变。

现在韩国学界公认的有别于古典小说的“新小说”起始于1906年,其代表作品为李人植在《万岁报》上以连载形式发表的《血之泪》。同时,韩国著名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李在铤主张把1904年在仁川发行的《大韩日报》上发表的一系列小说(《灌顶醍醐录》《一捻红》《龙含玉》《女英雄》《斩魔刃》等)看作“新小说”

① 汤哲声:《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流变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

② 陈平原先生曾指出,中国近代“新小说”应从1898年讲起,也就是说,戊戌变法在把康、梁等维新派志士推上政治舞台的同时,也把“新小说”推上了文学舞台。但是考虑到1902年之前基本是理论准备阶段,实际作品不多,同时为保持与韩国同阶段小说现代化的大体相当时间,综合其他研究者的观点,特将《新小说》创刊的1902年(20世纪初)作为研究的起点。

③ 刘纳:《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的开端^①。为了便于比较研究工作的开展,必须找到一个统一的起点,鉴于中韩两国小说现代化转型的各自特点,本书把研究的上限设定于1902年。这是因为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1902年对于中国小说现代化转型有着重要的决定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同时,陈平原曾指出:“‘新小说’是相对于‘传统小说’而言的,时人自觉地把作为小说界革命产物的‘新小说’和在此之前存在的中国传统小说区别开来。”^②因此,可以把1902年作为区别于古典小说的新小说之元年^③。虽然在1902年之前的几年间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文学事件,比如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出版,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发行,裘廷梁作《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梁启超作《译印政治小说序》,同时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下,中国文学开始了全面深刻的“裂变”,但是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小说革命”的理论基础和文学媒介等相关前期准备工作。同时,韩国虽然直到1906年才出现公认的第一篇区别于古典小说的“新小说”,但是1904年《大韩日报》上连载的一系列小说也初步摆脱了古典小说的藩篱,显示出“新小说”的某些特征,并且1902年创办《新小说》

① 李在铤在《新小说的勃兴与报刊》一文中,把1904年在仁川发行的《大韩日报》上发表的一系列小说(《灌顶醍醐录》《一捻红》《龙含玉》《女英雄》《斩魔刃》等)看作“新小说”的开端,但目前韩国学界公认的区别于古典小说的第一篇“新小说”为1906年李人植发表的《血之泪》。韩国“新小说”这一用语第一次出现是在1906年2月1日《大韩每日申报》之《中央新报》的广告文中,次年,《血之泪》以单行本出版时,标记为“新小说 血之泪”,此后“新小说”这一称呼开始普遍使用。

② 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③ 事实上,1902年之前曾出现过对“新小说”的召唤,但是仅仅限于“召唤”而已。1895年,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在《申报》上登载《求著时新小说启》的小说竞赛广告,他对“新小说”的呼唤比梁启超早了七年,而且关于小说揭露当前社会弊端并提出良方的概念比较接近晚清谴责小说的特性。因此,傅兰雅的小说竞赛给当时小说观念及后期“新小说”的出现产生了一定影响,“为中国的维新志士提供了以小说启蒙的方式和‘政治小说’的样板”(袁进:《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3页)。

的梁启超通过设在韩国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的代售点,其思想以及小说理论对韩国小说观念的变革、文体的革新以及创作形式等方面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另一方面,1917年,李光洙^①创作并在《每日申报》上发表的《无情》被公认为韩国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小说体现了对近代文明的憧憬以及对新教育思想和自由恋爱精神极力赞扬的主题意识。作为一部饱含民族热情和民族独立思想的小说,《无情》深刻地揭示了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引起了当时读者的心灵共鸣,成为肇始韩国现代文学的开端,作为一部具有先驱性意义的作品,被称为“韩国近代化过程的反映”^②。虽然韩国在1917年就出现了现代小说的嚆矢之作——《无情》,但是考虑到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力作——鲁迅的《狂人

① 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是鲁迅,那么同一时期在韩国,其现代文学的先驱应首推李光洙。李光洙(1892—1950),韩国诗人,小说家,号春园,平安北道定州人。曾三度留学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文学系、哲学系。1919年,在上海担任“韩国临时政府”的官方报纸《独立新闻》的主编。1921年,走上亲日道路,担任《东亚日报》的社论局长、《朝鲜文学》杂志的编辑。20世纪20年代中期,极力反对朝鲜无产阶级文学运动。1939年,加入亲日组织“韩国文人协会”,名字改为香山光郎,为侵华日军效力。李光洙在1943年到日本,动员学生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效力。1949年,因亲日叛国罪被逮捕,病后假释。李光洙文学创作始于1909年,作有小说、诗歌、散文、评论等,其中有20部长篇小说。他于1917年创作的小说《无情》被认为是韩国第一部现代小说。但由于李光洙在政治上的亲日倾向,很长一段时间,被指责为“卖国贼”,文学史对他的评价也就大打折扣。李光洙的第一篇小说《无情》被韩国学者看作是韩国现代小说的嚆矢之作。《无情》的内容梗概为:英语教师李亨植爱上了准备去美国留学的新女性善馨。这时他的恩师之女、崇拜他的英采出现在他的面前。为了营救含冤入狱的父亲,英采沦为了艺妓,后被裴明植强奸。她给亨植留下一封遗书,登上了去平壤的火车。在列车上英采偶遇新女性秉旭,她在秉旭的劝说下决定同去日本留学。为寻找英采,亨植去了平壤,但无果而归。于是他向善馨订婚后,踏上了赴美留学的旅途。但亨植、善馨、英采和秉旭等四人在火车上偶遇。火车到达三浪津时因水灾而延误。他们目睹了灾民的悲惨景况后,举行了慈善音乐会,募款帮助灾民。在此过程中,他们消除了个人恩怨,经过热烈讨论,他们立志肩负起以教育为本的民族复兴的使命。

② 全光庸:《韩国小说发达史》下,韩国文化史大系之六,首尔:高丽大学民族文化研究所,第1163页。